

Psychoanalysis

Listening to Understand

Selected Papers of Arlene Kramer Richards

Edited by Nancy Goodman

女性的力量

精神分析取向



〔美〕阿琳·克莱默·理查兹 著

南希·古德曼 整理

刘文婷 王晓彦 童俊 译

周娟 审校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Psychoanalysis

Listening to Understand

Selected Papers of Arlene Kramer Richards

女性的力量

精神分析取向

Edited by Nancy Goodman

「美」阿琳·克莱默·理查兹 著

南希·古德曼 整理

刘文婷 王晓彦 童俊 译

周娟 审校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性的力量：精神分析取向 / (美) 阿琳·克莱默·理查兹著；(美) 南希·古德曼整理；刘文婷，王晓彦，童俊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7.3
书名原文：Psychoanalysis: Listening to Understand
ISBN 978-7-5192-2553-7

I . ①女… II . ①阿… ②南… ③刘… ④王… ⑤童… III . ①女性心理学 IV . ① B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0351 号

Psychoanalysis: Listening to Understand © 2015 IP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book may not be reproduced, transmitted, or stored in whole or in part by any means, including graphic,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without the express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and review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copyright ©2017 by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女性的力量：精神分析取向
NǚXING DE LILIANG

著 者 [美]阿琳·克莱默·理查兹 (Arlene Kramer Richards)

整 理 [美]南希·古德曼 (Nancy Goodman)

译 者 刘文婷 王晓彦 童俊

审 校 周娟

策划编辑 曹文

责任编辑 曹文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37 号

邮 编 100010

电 话 010-64038355 (发行) 64037380 (客服) 64033507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wpcbj.com.cn>

邮 箱 wpcbjst@vip.163.com

销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2.5

字 数 51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192-2553-7

版权登记 01-2016-6386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母性之爱、有毒之爱、情欲之爱

——关于中国女性的生存与精神

（在“三八”妇女节的演讲）

“母性之爱、有毒之爱、情欲之爱”这个题目有点大，三者中任何一个，都够写一本书的。所以，我只是就这些问题建构一个大致的框架。在此我也告诉大家一个信息，2017年4月20日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女性大会将第一次在中国召开，由武汉市心理医院，也就是我所在的医院来承办。这是深度心理学第一次在中国开这样一个关于女性的大会，里面内容很丰富，而且来的都是世界级的讲者，有非常精彩的关于女性特别是中国女性的演讲。

中国女性百年发展史

现在回到我的主题，首先我们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来理解这个主题，我觉得我们至少要回顾近百年来中国女性的发展史，当然这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

我们如果离开了这个时代背景来谈中国女性的问题，来谈这个主题，我觉得那会不好理解，也是失之偏颇的。如果抽离这个时代背景，我们没有办法去谈母性、去谈爱，也没有办法去谈有毒的爱。所以我想提醒大家，要关注我们的这段历史。在这里谈到历史，我记起一个小故事。那就是20世纪90年代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网上已经有了中文版，作者是张邦梅，她是张幼仪（徐志摩前妻）的侄孙女，一个华裔美

国人。这是她的学位论文最后成书发表，取名为《小脚与西服》。当时，我记得是在哈佛大学大门对面的书店看到的，我被深深吸引，就坐在书店的地板上看了一天的书。

这本书里当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张幼仪在跟徐志摩离婚之后，还那么全心地服侍徐志摩的全家，甚至陆小曼没钱用的时候也找她。那么这个作者，就是张幼仪的侄孙女，这个华裔美国人是很难理解她的。她分析为什么张幼仪这么受虐。实际上张幼仪最后成长为一个非常优秀、独立自强的女性，这是后话。但是，她有那么受虐的历史。这本书里有一个张幼仪的成长背景：她出身于有名的封建大家族，家中兄弟姊妹十二个，其中八个男孩、四个女孩。但是当别人问张妈妈家中有几个孩子时，张妈妈总是回答——八个！张邦梅的书中有个标题是：In China, Women means nothing!

我想这就是我们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段历史，我们不能忽视这段历史。现在要稍微提一点，这样一段封建历史，到了1949年之后有一个非常大的变革，那就是毛主席给中国女性带来的翻身解放、扫盲，女性能顶半边天。这个功绩有多大不容置疑，但是，同时又把女性放到一个全能的位置。跟男性同工同酬的同时，还鼓励女性做一位英雄的母亲，就是生很多很多的孩子，一位女性怎样才能两者兼顾呢？我在这里不多言说，我有一个专门的论文在女性大会上谈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谈历史，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物质生活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丰富。但同时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大量女性回归家庭，做全职主妇，就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匮乏时期长大的母亲纠缠于一个物质极度丰富时期的独生子女。当然也有匮乏的父亲，但我们今天不谈父亲。

我们知道，心理学有一个常识，就是每个人都有无数次可以重新成长的机会。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自己先天不好，成长不好，或者童年、青少年有创伤，但是随着我们的孩子出生，随着我们养育他们，我们就会再有一次机会，修复我们自己的创伤。不过，如果你的创伤非常大的话，那么随着孩子出生也可能激活你做孩子时的创伤，这样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可能

你的所思所念所感都是你过去的情节，你体验的就是你自己，并将这个体验到的自己当成你的孩子。对此，心理学的术语叫作投射。

前面说，如果你早年有很大创伤的话，你孩子的出生可以激活你在你孩子这个时期的创伤。这个时候可能你就没办法关注你的孩子，而且还可能会有很强烈的、对这个孩子的无意识的怨恨。这个无意识的怨恨是：我这么贫苦，你还要我付出，我拿什么给你？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产后抑郁。暂时把这个话题放在这里，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样的爱是健康的爱。

母性之爱

前几年，我在美国纽约接受培训的时候，接触到了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一个非常伟大的美国女性心理学家西尔维娅·布洛迪，她今年105岁了，很健康。她从1964年开始，发起了一个历时三十年、有七十六位受访者参与的研究，就是从这七十六人出生开始，一共进行三十年的跟踪随访。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之类的机构资助她的这个项目。我们已经翻译出来这个研究项目的一本书《情感依附》，在中国卖得很好。研究人员们想要弄清楚，什么东西在孩子的成长发育中是最重要的呢？我在这里念一段：

在琼四个月大的时候，母亲把她抱在肩膀上。她们的目光跨过操场，投向正在给她们照相的父亲。母亲这个时候用鼻子蹭着孩子，孩子开始流口水，并且嘻嘻哈哈地笑。然后这个孩子把目光转向了母亲，就在同一时间，母亲的注意力却被其他东西吸引到了别处，她没有看这个孩子。这样就导致母女俩的眼神没有相遇，孩子脸上的笑容就逐渐消失了，僵在那里，目光也变得比较呆滞，脸上没有了表情……

心理学家们认为这种母女间的眼神交流，是孩子成长的最早的一个动力。这个眼神的错失，肯定会给孩子留下阴影，孩子会因为无法感受与母亲的情感联结而陷入沮丧之中。现在很多婴儿观察都有这样的情形，孩子

会僵在那里。对于刚刚生下来的那些小婴儿，母亲的眼光是很重要的。我自己有一个体验，这有点像芭蕾舞演员在舞台中心跳舞，这个聚光灯要一直跟着她转。一个孩子被送到人世的时候，母亲眼中的光辉就是孩子成长的源泉。

心理学上有个提法叫作恰到好处的（good enough）爱，什么叫“恰到好处”呢？母亲只要是在探索、在关注就够了。这个孩子在哭，可能是他太热了，可能是他饿了，可能母亲两者都找到了，但他还是在哭。没有关系，母亲不要焦虑，只要保持这种探索，实际上母亲的眼光聚焦在他那里就够了。很多时候，孩子不停地啼哭（当然要排除生理上的病了），其实就是因为孩子一哭，母亲就慌了，就焦虑了，这种信息传递给了孩子就造成恶性循环。我觉得中国母亲不是“good enough”，而是“too good”，就是做得太满，任何事情面面俱到。当然我说的这个研究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它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是西方文化的视角。那么，东西方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觉得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建立了一个将心比心的心理。但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心理学是要关注他者的。比如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说过，现代人际交往的黄金定义是同理心，要能将自己的脚放到别人的鞋子里试试。

孩子从四五个月、五六个月大开始，实际上他的成长之路就是为了摆脱母亲，就是挣脱母亲的怀抱。神经心理的发展也是这样，他开始只躺着，后来能够坐起来，坐起来他就爬，爬了之后他就会走。远离母亲，最后上幼儿园、上学校都是一个远离的过程。我们说整个神经系统发育成熟要到十四五岁，这之前母亲对他更多是呵护和保护。你要放他，但是你也要保护他。那么到十五岁左右，到了青春期，孩子产生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要离开母亲。我们说真正的母性之爱，就是要给孩子授权，让他们不为背叛你而内疚！阿琳在《女性的力量》这部著作里，用大量案例提到弗洛伊德对他的所有女性病人授权，让她们或反抗他或超越他。阿琳同时认为，这是精神分析的精髓所在。

说到这里我还想要提一下，就是现代的女人和古时候的女人是不同的。现代女性活得多，1949年前女性死的时候很年轻，平均寿命很低，因为很多人在生产的时候就死掉了；现在女性活得多，在大城市女性的平均寿命有八十多岁了。这样女性从停止生育到死亡，可能中间有长达三十年的时间，还不止。也就是说，从不需要抚养孩子到死亡，她有长达三十年的时间，而且现在的女性只有一两个孩子，不像我们的父母辈那样。

实际上女性不生孩子，不怀孕，就获得了很多自由，女性活得多，经济条件都还很好，比以前好多了，那么现代女性就面临这些改变导致的对新的欲望和梦想的探求，随着欲望而来也会有恐惧，这些是跟传统女性不一样的。我自己观察，我的外婆、我的母亲、我自己和我的女儿，在这四代女性身上我发现的是每一代女性都在跟随这个社会进步，在追求独立，一代更比一代好。对于其中最新的一代，你会说她们碰到了大好时光，但同时也会有更多的焦虑，因为前面的路都是新的自我探索，我们的前辈并没有留下女性独立的遗产。

有毒之爱

我们总是歌颂母爱多么伟大，但实际上无论男孩还是女孩的内心都身怀一个母亲会吃了自己、杀了自己的恐惧。大家想想，这个女人多牛啊，她给你生命，你依赖她成长，你没有她就活不下去。对这样一个人，你同时也会觉得，她也可以拿走你的生命，我想这就是孩子对母亲最深刻的一个恐惧来源。所有的孩子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只要是人类，他从被母亲生下来那一刻开始，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从子宫出来剪掉脐带开始，他实际上就从一个“生物的人”开始了“心理的人”的成长过程。那么，在这个“心理的人”的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实际上是与母亲分离。孩子要离开母亲，要自己掌控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由你掌控，他这一步一步的成长，走得也战战兢兢，带着背叛的内疚。

青春期的时候，这种反抗会更激烈，所有的这些反抗都是为了成长。那

么作为母亲在这个时候，能鼓励孩子反抗你吗？孩子会跟你吵啊闹啊，这好像是一种暴力，但是心理学上认为，这不是暴力，这是成长的一种需要。什么样是最大的暴力呢？最大的暴力就是：在该分离的时候跟你紧紧依附在一起。

与母亲连在一起，绝不分离，这是最大的暴力。为什么孩子不能跟母亲分开呢？因为孩子内在有一种巨大的恐惧，他觉得我们刚才讲到所有成长，其实就是要反抗父母，然后往前走。孩子也会因为离父母越来越远而内疚，他觉得我背叛了父母，会有背叛的感觉。那么父母在这个时候要给孩子这种行为赋予阳性的意义，就是给他授权，这是一种成长。如此，这个孩子才走得坚决。如果孩子本来就带着这样的一些内疚，他觉得背叛父母了，父母也认为孩子是白眼狼，那孩子就难以向前迈步了。

这就成了一种纠结的力量，分离和退缩在原点上来来回回，看不到变化，我们称之为施虐和受虐。谈到这一点，女性气质里有一个被公认的受虐倾向，从生物学上来说，女性生孩子就是受苦的，生下孩子她会快乐，所以有些人认为，女性这种生理特征构建了女性的受虐倾向。我们现在不讲生理的东西，我们讲心理的东西。我想这种受虐倾向很多是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女性处于次等地位这样一个几千年的历史中所形成的。你就是二等公民，或者你就像张幼仪一样什么都不是。

一个叛逆的孩子遇上一个有受虐倾向的母亲，就激活了这种母亲早年被抛弃的感受。所以在这个时候，她跟孩子纠缠在一个心理水平。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孩子是没有母亲的，这个时候施受虐就发生了。我再强调一次，我现在讲女性的话题，没讲男性的施受虐，男性是一样的。这样的施虐、受虐从来都是同时发生的，那么我们说这样的施受虐后面是什么呢？实际上施受虐背后就是强大的分离障碍，没有办法分离，不能分离就妨碍了人类心理的发展。当个体身处恐惧，相信任何生命活力都会招致惩罚时，其生命就固着了，成长就停滞了。

我们前面谈到有毒的爱背后最重要的就是分离障碍，就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紧紧和母亲纠缠在一起。总结起来，人类实际上建立了两个自我调

节和解决冲突的系统。一个是开放系统，它适应现实，其特点是可以带来快乐。它有创造力，能促进能力的发展。这个系统我们就把它称为心理健康。另一个是封闭系统，因为封闭的系统依赖于将自己当作受害者的感觉，所以基于现实的快乐超出了他的想象，被体验为对其无所不能之信念的威胁。因为他自己就是受害者，他就觉得别人都是对他不好，都是不快乐的。现实是他有时候快乐，然而这个快乐来了之后他是很恐惧的，因为这超出了他的想象，所以其自我能力的一些功能被用于维护他的防御和信念。这样一个封闭系统是所有无器质病变疼痛的来源。我们有很多躯体的疼痛就来自这样一个系统，就是不断自我强化的这种受苦受难的感觉。

另外一点，这种有毒的爱还带着一种对心理现实的憎恨。它经常在个体的想象系统中，体现为不同的破坏水平。它的残酷程度跟现实、跟个体被唤起的对现实的憎恨强度有关。那就是现实越跟其想象不一致，他对现实就越憎恨。

说到这里的时候就要强调一点，具有这种有毒之爱的个体，她没有能力提供前面研究里提到的母亲的爱的眼神。我们说那个母亲的眼光老是跟孩子的眼光打岔，联结不到一起，所以这种有毒之爱就要利用施虐紧紧纠缠在一起，以达到联结的目的。纠缠是为了联结，但同时他又恐惧母亲把他给吞噬掉了，他永远在建立联结和逃离联结之间循环，没有变化，也没有成长。

情欲之爱

在这里，先要区分一下情欲之爱，“sexy”和“erotic”，sexy指性感，是正常发展、自然发展的一个结果。性感的爱，首先人要完成分化，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两个独立的个体才能发展真正的相亲相爱。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心理发展跟男性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男孩、女孩都由母亲生下来，但是男孩的发展比女孩的发展要简单一点，为什么？他由母亲生下来，他就是爱母亲的，父亲对他来说就是一个

外人。因为在男孩的心里就是，我要长得像父亲那样强大，未来才可以拥有一个像母亲这样的女性。他会向父亲学习，而放弃对母亲的爱。女孩发展的复杂性在哪里呢？她由母亲生下来，她要跟母亲分离，她要背叛母亲，然后她要发展恋父的过程，恋父的过程是把她从母亲的怀里拉开，但是她最终还是要回到母亲这边。男孩没有这样复杂。女孩首先要有一种力量离开母亲，她恋父的过程实际上帮助她发展她的女性气质，但是她最终不能老是一个恋父的小女孩，她最终的成长是要放弃恋父，回到对慈母的认同，这样她才能发展她的女性气质。这就让她比较纠结了，很多时候既要爱，又要放，还要再回来，各种各样的曲折导致女孩的心理发展比男孩的心理发展更加困难一些。

女性只有完成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从母亲怀里分离，恋父，最终放弃恋父再回到母亲身边来，对母亲认同，发展女性气质，如此，她才能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性感的、能够去爱的、既有母性也有女性气质的一个女人。跟男性相比，女性是要比男性更多一些双性恋倾向的，因为她既爱母亲也爱父亲。我在这里指的是倾向，不是指具体的双性恋行为，而是指内在的幻想。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就成了真正的女人，一个独立的女人，这样她才有真正的情欲之爱。我们看见很多性乱的人，那些人有很多很多的恋人、很多很多的情人，等等，实际上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有一种色情性，这其实是一种防御。这种防御是什么呢？这是他的婴儿式的，或者他的人格中婴儿部分的创伤，他用一个成人的行为来防御自己婴儿式的匮乏，实际上表现为色情，但真正的心理位点还困在婴儿期，或者在乳房的那个时期。为什么要用一个成人的行为（性）来防御这些呢？因为他很恐惧，他要装成一个大人、一个成人，来掩饰早年这种婴儿式的匮乏。有很多这种性乱的人，实际上你对他深入了解就会发现，他是没有过性快感的，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一个真正有魅力的、有性快感的女性，她有心理上、人格上的独立和成熟，这样她才能够具有女性的魅力，担担起母性的责任，以及相应的社会职责。

对于如何认识女人，如何成为新时代的女性，我强烈推荐阿琳的这部女性心理学巨著——《女性的力量》。它会刷新你的女性观，带给你关于女人的新的洞见。

童俊

教授，中美精神分析高级培训项目中方负责人

IPA认证精神分析师，武汉市心理医院副院长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

中国女医师协会心身医学与临床心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科学研究基金评定委员会CERP研究基金评定专家

女性与哲学

我们小小的传统

谈论“女性与哲学”，不可避免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女性这个性别是否适合哲学活动？通常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女性从事哲学，受到伤害的不只是哲学，还有女性本身。

支持这种看法的有力证据在于——翻开哲学史，女性哲学家实在是太少了，连凤毛麟角也谈不上。

这的确是事实。但是，与这个事实相伴随的，是在一个更大范围内发生的、更加普遍的事实：女性从根本上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显然，哲学活动只在那些会读写的人中进行。

除了一般的会读写之外，要从事哲学活动的话，还要接受一种比较系统的学科训练，那是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才能够完成的。这种训练包括了解漫长的哲学传统，了解什么是恰当的哲学话题而什么不是；也包括培养一种聚精会神的、绵延性的思维习惯。

古代的学园书院、现代的大学，都是进行这种学科训练的最好场所。比起其他某些学科，哲学学科更需要一个宽裕的、充裕的甚至是优裕的生活环境，对于从事哲学活动的人，人们对他们的要求比对别人要少。

显然，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女性完全被排除在这样的活动之外，不具有哲学活动所要求的宽裕环境，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所有那些关于女性不合适从事哲学活动的说法，都是和这个剥夺女子受教育权利的野蛮事实相伴随的，那是人类一段不光彩的、对男性来说也并非理直气壮的历史。

用一种制度将女性排除在某个领域之外，反过来又说在某个领域中见不到女性，这就很说不过去。这里用得上福柯关于权力产生知识的说法：权力产生知识，知识反过来表达权力系统。

没有比在女性和哲学的关系中更能够体现这一点。女性不可能从事哲学，是因为存在一个对待女性的接近奴隶制的权力系统。

而所谓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也表现为——即使那样一种东西作为制度已经消亡，但是人们大脑中关于女性不适合从事哲学的观念，仍然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不仅是在哲学领域，那种把女性当作次一等的人类的观点，在许多领域仍然大行其道。并且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在哲学领域中，有人继续对女性持歧视态度，是保持他们不多的特权和不多的自尊的最后场所。

但无论如何，今天还在复制着那种野蛮制度下的意识形态神话，只是一个人的白日梦而已，属于弗洛伊德-阿尔杜塞所说的“残羹剩饭”“日间余思”。

我们来看，1882年出生的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为了准备一个“妇女和小说”的题目，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图书馆周围行走，想进去寻找一本有关的参考书，但是被人礼貌地劝退，说女士们必须有一位本校的研究生陪同，或是有一封介绍信才准走进这个图书馆。

伍尔芙抱怨自己因为是女性，便不能和兄长们自由出入这个地方。她本人没有上过大学。而这种情况不久就得到了改变。她们是20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生的：汉娜·阿伦特（1906）、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西蒙娜·薇依（1909）。她们都在男女同校的大学课堂上完成了哲学学科训练。

1927年6月，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颁发了当年的普通哲学证书，获得前三名的依次是西蒙娜·德·波伏瓦、莫里斯·梅洛-庞蒂和西蒙娜·薇依。

1924年汉娜·阿伦特来到马堡，在海德格尔的课堂上引起了这位教授的注意；继而在弗莱堡大学短暂停留，并在胡塞尔门下读了一个学期之后，于1928年年底22岁时，获得了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导师是雅斯贝尔斯。

这些在20世纪20年代拿到哲学证书或者学位的人，到40年代才开始形成或者发表她们的东西，波伏瓦的《第二性》第一版在1949年问世；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在1950年出版；西蒙娜·薇依生前只发表过一些文章，在她1944年病逝之后，她的手稿、笔记被人整理，于1947年之后陆续出版。

这个名单只是我为准备这个序言临时想到的，她们已经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从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一个小小的女性哲学家系列。如果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女性哲学家的传统的话，那么，这个传统到今天为止，还不到区区六十年。

但是，毕竟已经有有了一个开端。这个开端意义非同小可，这几位女性先驱者，为后来不管在多大程度上涉足哲学的女性撑起了一片天空。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里谈论这个话题，和她们所做出的杰出成就有莫大的关系，我时常感到在我的背后或者前方，站立着我的这些女前辈。我深深地感激她们！

目前我手上还没有足够的资料，表明我们在中国传统中——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女性在哲学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但是再过五十年或者一百年，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女儿的女儿，或许会就中国哲学的女性传统大有可谈。

阿伦特和艾克曼的对峙

让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场景：1962年，作为《纽约客》特约记者的汉娜·阿伦特从美国飞往耶路撒冷，参加正在那里举行的对纳粹战犯艾克曼的刑事审判，她负有报道这场审判的责任。

艾克曼这个纳粹分子，在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行动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1945年之后他隐姓埋名、东躲西藏，最终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的摩萨德特工捕获。

作为犹太人，大家知道阿伦特本人于1933年逃亡，先是在法国，然后在美国，在漫漫流亡道路上吃尽了苦头。这一回，她终于有机会面对纳粹统治时期的一个代表人物。

阿伦特坐在听众席上，观看这场审判。

非常凑巧的是，阿克曼和阿伦特一般年纪，同为1906年生人。阿克曼坐在一个玻璃匣子里，阿伦特形容他像一个“玻璃匣子里的魔鬼”——中等个子，瘦削，额角很高，牙齿歪扭，近视眼。

阿伦特后来说自己在阅读卷宗时，不时地发出大笑，因为阿克曼实在像是一个小丑。而他对自己的罪行所做的辩护，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阿克曼解释，自己那样做是为了“执行上级的命令”。在“国家法定的罪行”面前，他只是一个“尽责的守法公民”。他甚至搬出了康德，说他遵守法律是在实践康德道德哲学的律令。

当战争后期，纳粹国家机器中有人开始和犹太人组织做交易来换取犹太人的性命时，阿克曼没有这样做，他认为这是自己“良心”所要求的。

这一切看起来并不像是狡辩，非常有可能，如果不是生活在那个时代、身处纳粹高官的位置，放在另外的环境中，阿克曼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是一个遵纪守法的良民。

阿伦特克制了自己的反感。她在给丈夫布留歇尔的信中写道：“所有这一切极端正常而又令人难以描述地卑劣和令人厌恶。”理智告诉她，这个人所说的对他自己来说都是真实和真诚的。

那么，是什么导致这个人毫无顾忌地加入这场杀人游戏呢？是什么令一个所谓正常的人，做出了如此巨大的反常之事？她的解释是——阿克曼既非愚蠢也非不道德，他只是平庸，没有思想，不去思想。

他所做的所有异常和极端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深刻而邪恶的个人品性，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丧心病狂”的，是“邪恶万分”的。相反，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从来不用自己的大脑，不用哪怕是片刻的时间去想一想，这样做甚至起码违背了一个人与生俱来的那些自然倾向：不杀人。

他要去克服和越过自己身上的这些自然倾向，才能做到所谓在国家利益面前“尽自己的责任”。他像一部超自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一样，只是接受环境的指令。阿伦特的这些看法开始由报纸陆续发表，后来结集为《耶路撒冷的艾克曼》一书，其中所创造的“平庸无奇的恶”的提法，引发了后来很多话题和争议。

1971年，距离她1975年逝世前不久，她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在一篇题为《思考和道德判断》的文章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对于从来不动脑筋的艾克曼来说，纳粹这一套法典和规则，与用来审判他的另外一套法典和规则，意义是一样的。

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抛弃其中一套，承认另外一套，好像只是不同的语法知识。而造成这种完全不思考现象的根源在于：这种人，从来不面对自己，从来不和自己对话，回避与自我的交流。

阿伦特认为是苏格拉底首先发现了这种自我存在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而什么叫作“思考”呢？阿伦特认为“思考”是一个中断，它中断了所有的日常作为。“一旦我们开始任何思考，即中断任何事情……一开始思考，我们就好似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从事思考，好像从事“某种跟人世间的作为相反的东西”。这种“反方向”的思考不仅产生不了实际的结果，它还会令已经有结果的归于无效。

她引用了康德所说的，我们的心智均有一种自反（aversion against it）的倾向。阿伦特继而打个比方说：“思考之事就像珀涅罗珀的织物（the veil of Penelope），它在每天清晨毁掉昨夜完成的事物。”

提供这个场景，我想说明什么？我想说——男性也有完全不思考的，女性也有具有杰出思想的。并不是说，“是个男人”就会天生具有哲学上的智性方面或者思辨方面的优越性，而“是个女人”就不具备这些。我再引入一位人物，海德格尔。

从性别上说，海德格尔与艾克曼是一方的，阿伦特不属于他们这一方；从思想上来说，显然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是一方的，而艾克曼属于另外一方。